

语文教育论稿

程媛 著

黑龙江教育出版社

图书在版编目(CIP)数据

语文教学论稿/程媛著. —哈尔滨:黑龙江教育出版社, 2006. 3

ISBN 7-5316-4577-7

I. 语... II. 程... III. 汉语-语言教学
IV. H19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2006)第 030127 号

语文教学论稿

Yuwen Jiaoyu Lungao

程媛 著

责任编辑 梁 昌

封面设计 傅 旭

责任校对 尚 言

出版发行 黑龙江教育出版社

(哈尔滨市南岗区花园街 158 号, 150001)

印 刷 哈尔滨久利印刷有限公司印刷

开 本 850 × 1168 毫米 1/32

印 张 10

字 数 230 千

版 次 2006 年 5 月第 1 版

印 次 2006 年 5 月第 1 次印刷

书 号 ISBN 7-5316-4577-7/G · 3484

定 价 28.00 元

前 言

语文教育是一个老话题,在从古至今的语文教育研究中,人们多从理论、实践两个层面展开研究探索,力求结论贴近实际。

首先,本书沿袭了这种传统的研究方法,并从历史的角度切入,将语文教育置于广阔的背景和深远的社会发展的坐标中进行分析,克服了以往研究中只从语文教育本身,或语文与语言文化关系的角度去考虑语文教育问题的片面性。该研究对认识和反思语文教育的得失和深化语文教育的改革,具有一定的理论和应用价值。

其次,围绕语文教育的价值取向,选取了一些语文教育的断裂点,如关于人文精神问题,情感体验问题,学生个性心理问题,民主平等问题,生活拓展问题,等等,以具体的材料进行阐述。特别是将新课改对人的关注这一理念融入对问题的分析中,通过对语文教育的研究,体现不同程度的突破与创新。

最后,借助文化研究的结构框架,对中西语文教育比较问题提出了具有批判性和建设性的思想,在中国社会正经历重大转折的历史时期,这样的思考对语文教育来说,有着特殊的意义。

作为一名从事语文教学论的教师,深知对语文教育的研究任重而道远,但我愿为此尽点滴微薄之力,以引起更多的同行对语文教育的关注和争论,推进语文教育研究的深入。

编 者

2006 年 4 月

内容简介

语文研究,在我国已有悠久的历史,而把语文作为一门学科研究,还只有近百年的历史。《语文教育论稿》一书力求从语文教育的角度,运用教育学、心理学、哲学、美学等理论知识,结合语文教学,把语文教育的诸多问题作为一个有机整体加以关照、审视、探讨。全书共分十二章:第一章,中国语文教育演进,从古代、近代、现代的角度梳理语文教育的发展脉络。第二章,新时期中国语文教育,从正反方面来剖析新时期的中国语文教育。第三章至第十一章是选取人文精神、情感体验、学生个性心理、民主平等、生活拓展、创新思维、审美意识、语文学习心理、语文教材等新课改中焦点比较集中且探讨比较热烈的问题、结构语文教育研究的主体部分。第十二章,中西语文教育的交融,是吸收国外语文教育的研究成果,联系我国语文教育,更好地体现本书的时代特色。本书旨在对语文教育的理论工作者和教学一线的语文教师研究语文教育提供一些帮助,为推动语文教学改革的发展略尽绵薄之力。



目 录

第一章 中国语文教育演进	(1)
第一节 古代语文教育	(1)
第二节 近代语文教育	(8)
第三节 现代语文教育	(18)
第二章 新时期中国语文教育	(31)
第一节 新时期中国语文教育现状	(31)
第二节 新时期中国语文教育反思	(37)
第三节 新时期中国语文教育前瞻	(46)
第三章 语文教育与人文精神	(53)
第一节 语文教育的人文主义传统	(53)
第二节 人文关怀:语文教育的价值取向	(59)
第三节 语文人文关怀与新课改	(64)
第四章 语文教育与情感体验	(82)
第一节 语文情感教育	(82)
第二节 体验:语文情感教育本源	(87)
第三节 语文情感体验与新课改	(91)
第五章 语文教育与学生个性心理	(102)
第一节 现代语文个性的教育追求演变	(103)
第二节 语文个性的教育价值	(107)
第三节 语文个性的教育与新课改	(113)
第六章 语文教育与民主平等	(126)
第一节 语文教育师生观	(126)



第二节 语文教育民主化理论探究	(136)
第三节 语文教育民主化拓展与新课改	(148)
第七章 语文教育与生活拓展	(161)
第一节 学科性质决定语文教育生活化	(162)
第二节 语文教育呼唤生活化	(168)
第三节 语文教育生活化拓展与新课改	(174)
第八章 语文教育与创新思维	(181)
第一节 语文教育与创新思维回顾	(181)
第二节 创新思维对语文教育的意义	(190)
第三节 语文阅读创新思维与新课改	(202)
第九章 语文教育与审美意识	(206)
第一节 审美意识的本质和特征	(206)
第二节 审美意识的心理机制	(210)
第三节 语文审美意识与新课改	(219)
第十章 语文教育与语文学习心理	(224)
第一节 语文教学的心理流向	(224)
第二节 师生心理同步的语文教学过程	(238)
第三节 语文学习心理与新课改	(241)
第十一章 语文教育与语文教材	(248)
第一节 语文教材的人文化品性	(248)
第二节 语文教材理论研究	(254)
第三节 语文教材与新课改	(261)
第十二章 中西语文教育的交融	(272)
第一节 中西文化对语文教育的影响	(272)
第二节 中西语文教育比较	(278)
第三节 中西语文教育的交融	(292)
参考文献	(304)
后记	(312)



第一章 中国语文教育演进

我国的原始社会,大约从 170 万年前开始,到公元前 21 世纪结束;奴隶社会中期以前包括夏代和商代,至少从公元前 21 世纪到公元前 11 世纪,这是一个相当漫长的历史时期。在此期间,人类经历了洪荒时代、蒙昧时代和野蛮时代,开始向文明时代迈进。人们出于生存、生活的需要而进行群体生产劳动;为了使劳动更有成效,必须制造劳动工具。由此,传授技能和经验成为必需。我国古代的教育,就起源于使社会成员适应群体社会生活和群体生产活动的需要。

第一节 古代语文教育

一、言文教育期

原始社会和奴隶社会中期以前的言文教育,虽然内容贫乏、形式简单,处于混沌、粗疏的状态,还不是严格意义上的语文教育,但是,它为我国以后的语文教育提供了最原始的教育思想。言文教育,在这里是指从原始社会到奴隶社会中期的语文教育。

(一)语言来自生活

言文教育的基本思想之一,是语言来自于生活,生活是学习语言的大课堂。在生产实践和社会交往中,人们依靠口耳授受的



方式传播和学习劳动技能,从而促使口头语言不断发展,以至创造了谚语、歌谣、神话、寓言等口头文学。这粗糙而生动的言语教育,既来自于生活,又服务于生活。可以说,学语言就是学语言,学语言就是学生活,广阔的社会生活就是学习语言的大课堂。这一朴素的道理是语文教育最基本的规律。我们今天常说的“语文学习的外延和生活的外延相等”,就是这个道理。

(二)文字读写训练是语文教育的基础

言文教育的基本思想之二,在于文字读写训练是语文教育的基础。《易经·系辞》有云:“上古结绳而治,后世圣人易之以书契。”“书”是写在竹帛上的文字,“契”是刻在木石或甲骨上的文字。前者用笔,后者用刀。由结绳而象形、书契,这是中国文字最早的发展史实,是语文教育发展的一种巨大的推动力。

以文字作为教育的工具,需要一批知书识字的人来担任传授的工作,于是教师职业开始形成。尽管他们的主要任务是从事思想政治教育、人伦道德教育、军备教育和礼乐教育,文字读写教育处于从属地位,是为上述诸种教育服务的,但是,由于文字读写是基础,而且文字数量多、结构繁,难认难写,花费时间多,因而使得它在学校教育活动中占有较大的比重。这种以文字读写训练为基础的教学传统,对以后绵延了几千年的语文教育产生了很大的影响,直到今天仍为我们所重视。

二、古文教育期

古文教育即传统语文教育的基本经验,是我国语文教育的财富。古文教育一直比较重视读写基础训练,重视诗书的教化作用,重视内外的文化交流,这可以说是这一时期语文教育思想的主要特点。



(一)读写基础观

重视读写基础训练,是古文教育的重要原则。这种基础训练又分为两步:第一步是学习识字和写字,第二步是学习阅读和写作。

1. 识字和写字。作为读写训练的基础和前提,历代都非常重视识字和写字教育。以“三、百、千”为代表的蒙学课本,使用时都是首先从识字教育开始的,然后再进行写字训练。当然这些课本也不仅仅是供识字、写字使用,还有思想政治、伦理道德、知识教养等方面的教育作用。

2. 阅读和写作。经过识字和写字训练之后,接着便是阅读和写作训练。古人十分重视阅读和写作训练,《学记》里就有“呻其占毕”的记述,意思是诵读简册,可见诵读古已有之。王充在《论衡·自纪篇》里说:“手书既成,辞师受《论语》、《尚书》,日讽千言。”(“讽”也是诵读的意思)程端礼的《程氏家童读书分年日程》里说:“每细段要读二百遍:默读一百遍,背诵一百遍。”这里的“千言”、“百遍”都是言其多。可见,多读是古代阅读教学的一条基本思想,曾经有“读书百遍,其义自见”,“熟读唐诗三百首,不会作诗也会吟”等说法。这就是说读得多了,就能理解文章的意义;读得熟了,就能学会文章的写法。当然,多读、熟读,也要伴随着多方面的思考。所以朱熹在总结读书思想时说,要“循序而渐进,熟读而精思”。

古人除了提倡多读、熟读和精思以外,还十分讲究消化吸收,使所读所思变为自己的东西。黄宗羲在《宋元学案》里说:“读书始读未知有疑,其次则渐渐有疑,中则节节是疑。过了这一番后,疑渐渐解,以致融会贯通,却无所疑,方始是学。”从无疑到有疑,再从有疑到无疑,就是一个消化吸收的过程。郑板桥有“攻扫读



书法”，说是“善读者曰攻、曰扫，攻则直透重围，扫则了无一物”。这“了无一物”就是透彻理解，有自己的心得。孙德谦在《古书读法略例》中有所谓“半日读书，半日静坐”的读书法，提倡静坐而思，同时提倡自为删减修改、自为经传的读法，即不仅读经、解经，还要自为经传，充分发挥创造性。

阅读与写作密切相关，古代对写作训练的重视不逊于阅读训练。欧阳修谓为文有三多：看多、做多、商量多。说的是作文要多观察，多练习，多修改。唐彪在《读书作文谱》里说：“文章惟多作始能精熟”，“读十篇不如作一篇”，“世人既懒读书，又苦作文少，每一篇出，即求过人，如此少有至者。疵病不等待人指摘，多作自能见之。”这些话在一定程度上反映了写作教学的规律性。谈文章作法的书不少，如李涂的《文章精义》、倪士毅的《作文要诀》、高琦的《文章一贯》、黄宗羲的《论文管见》、归有光的《文章指南》等，都是谈文章作法的。

到了清代，兴起了评点之学，讲究文章作法和读法。李扶九的《古文笔法百篇》，就是典型的例子。在钱泰吉的《曝书杂记》里说：“王鲁斋先生凡例：朱抹者纲领大旨，朱点者要语警句也。墨抹者，考订制度，墨点者，事之始末言外意也。”提倡用“抹”、“点”的符号和“赤”、“墨”的颜色来评点古文，使阅读深入一步，同时促进写作能力的提高。

（二）诗书教化观

古文教育期非常重视诗书教化的作用，表现在教化的目的和教化的实施两个方面

1. 教化的目的。古文教育的最终目的，在于“化民成俗”、“建国君民”。《学记》中说：“古之王者，建国君民，教学为先。”又说：“君子欲化民成俗，其必由学乎？”意思是说，古代的帝王、国



君,如果要治国、育民,就要把教育摆在首位;如果要教化民众,养成良好的社会风气,也必须从兴办教育始。儒家学者认为,“诗书教化,所以明人伦也。”意思是说,诗书教化的目的在于张明伦理,进行道德教育。讲教化而不讲刑罚,这可能就是中国历代人君不习惯法制的思想根源。诗书教化,就是提倡在诗书教学中,以和风细雨的方式,进行人伦道德的潜移默化,所谓“寓教于诗,寓道于文是也”。

2. 教化的实施。古文教育的诗书教化作用,主要是通“四书”、“五经”的教学来进行的。此外还有:古代的神话说,如精卫填海、夸父逐日、女娲补天、后羿射日等,先秦诸子百家、诗经、楚辞;两汉的史记、汉书,魏晋南北朝的辞赋,唐诗、宋词、元曲、明清小说和历代散文等,还有各个时代典型文体和名篇佳作。它们对古文教育的思想影响是极其广泛而深刻的。有讲为政、为人的,有讲治学、治军的,有讲理家理财的,有讲抗暴、抗灾的,有讲爱国、爱民的,有讲为仁为义的,有讲知命、知性的等等。通过这些典范性作品的教化作用,培养爱国主义思想,安贫乐道思想,除暴安良思想,不畏强暴、见义勇为的思想,学无止境、精益求精的思想,精兵简政、为政清廉的思想,自强不息、人定胜天的思想等等。可见,古文教育思想的确是多方面的。

《诗经》是古文教育的主要内容之一。孔子十分重视诗教,他说:“不学诗,无以言。”又说:“诗可以兴,可以观,可以群,可以怨。迩之事父,远之事君,多识鸟兽草木之名。”说的是诗教有七大作用:一是感发志趣,二是考证得失,三是团结和睦,四是怨而不怒,五是孝敬父母,六是效忠君王,七是多识鸟兽草木之名。所以知识的获得,思想的启迪,情感的陶冶,意志的激发,都是诗教的结果,也是诗教的作用。



汉代的董仲舒,把一个国家的治乱兴废归之于礼乐教化。他虽然被称为“汉代孔子”,但思想比孔子落后。他忠实于封建统治者的思想是反动的,但是他重视德化教育,却是与春秋战国时期的儒家思想一脉相承。他在《玉杯》里说:“《诗》、《书》序其志,《礼》、《乐》纯其美,《易》、《春秋》明其知。”意思是:《诗》、《书》可以表白情志,《礼》、《乐》可以美化风俗,《易》、《春秋》可以鉴往察来,开发智慧。序志、纯美、明知,讲的就是诗书教化作用。反对董仲舒的王充,也提倡培养“尽材成德”的“鸿儒”,认为作礼乐就是为了改造性情,变化志气。他更加注重实际,主张“事莫明于有效,论莫定于有证”。这是朴素的唯物论思想,认为学了不仅要“化”,还要见之于行动。

唐代“文起八代之衰”的韩愈,则在《原道》里说:“其文,《诗》、《书》、《易》、《春秋》;其法,礼、乐、刑、政;其民,士、农、工、贾;其位,君臣、父子、师友、宾主、昆弟、夫妇;其服,麻丝;其居,宫室;其食,粟米、菜、蔬、鱼、肉;其为,道易明,而其为教易仁也。”这就是说,作为儒家“道统”的仁义道德,已经渗透到了社会生活的各个方面,衣食住行,叔伯兄弟等等,无处不在。载之于文字,是诗、书、易、春秋;形成为典章制度的是礼、乐、刑、政;为教的根本目的,就在于使受教育者成为在道德上体现“仁爱”思想的人。可见,诗书教化要求从生活的各个方面体现出人伦道德的水平。当然,这种人伦道德,在古代社会只能是为封建统治者服务的。但它作为中华民族的精神力量和思想灵魂的表现,应该说还是传统文化的有益积淀,是可以批判地借鉴的。

宋代的朱熹,也是我国古代一位类似孔子和韩愈的有影响的古文教育家,是儒家学派的典型代表,是理学的集大成者。他也很重视诗书教化的作用,他说:“读书穷理,当体之于身。”他所力



求达到的标准,自然也是儒家的“仁义礼智”,“诚意、正心、修身、齐家、治国、平天下”。这样的标准,已经不单是儒家文化思想的反映,也包含了法家、墨家和佛家、道家的文化思想。这种多元化结构,是经过历史上各学派相互之间无数次的撞击和渗透的结果,这也正是传统文化的反映。

(三)文化交流观

古文教育期的文化和教育,都受着内外文化交流的影响。

1. 内部交流。文化教育的内部交流影响着语文教育的发展。春秋战国时期,有儒、道、法、墨、名、阴阳、纵横、杂、农、小说等十大学派。后来,儒家又一分为八,墨家又一分为三,形成了百家争鸣的“鼎盛”时期。这就是文化内部交流的结果。学术思想的活跃,使这一时期的语文教育思想得到了蓬勃的发展。

2. 对外交流。文化教育的对外交流,从秦统一中国以后就有很大的发展。以汉族为中心的中国文化与世界各国的文化交流,特别是印度佛教以及雕刻、乐器的传入,使我国的文化教育发生了许多新的变化。南北朝时期,是国内各民族之间文化交流的时期,北方各民族加速了汉化的过程,南方的经济和文化进一步得到了开发。同时,中国与西方、南方及东北各邻邦的经济文化交流的机会也越来越多,与日本、朝鲜互派留学生,相互学习,取长补短。到了魏晋时期,玄学与佛学趋于合流,佛经用玄学语言加以翻译,使汉语吸收了不少外来语,部分佛经也作为汉语文教育的内容使用。到了隋唐五代,对外文化交流日益频繁,成为唐朝社会繁荣、政治稳定的重要因素之一。唐朝高僧玄奘为探求佛理,历尽千难万险,终于从印度取到了真经,为中印文化交流作出了巨大贡献,对我国古代的语文教育也产生了深远的影响。《西游记》就说明了这一事实,历代的语文教学中都有选取《西游记》



部分篇章作为教材的。现代汉语里的词汇如“世界”、“刹那”、“功德无量”、“五体投地”等等,都来源于佛经。与此同时,国外的逻辑学、音韵学、新医学等也相继传入中国,明代杰出的启蒙教育家徐光启还提出了“向西方学习”的口号。在学习理科和数学等的同时,也引进了人文科学和社会科学中先进的东西。这一切,对我国古代的语文教育都产生了良好的影响。

当然,中国文化对外域也产生了积极的影响,日本在我国隋唐两代不断派僧侣和学生来中国留学,把中国的文化和各种上层建筑的意识形态吸收过去。在这样的交流中,语文教育思想得到了相应发展。

第二节 近代语文教育

近代语文教育时期中国经历了鸦片战争、第二次鸦片战争、洋务运动、中法战争、甲午战争、维新运动、八国联军侵华、辛亥革命等内忧外患的侵扰。中国人民一方面不屈不挠地进行英勇的反帝反封建的斗争,另一方面又多方探求拯救、振兴中华之路。

一、文学设科期

清末新学制确立以后,“中国文学”单独设科,并由此开始了中国语文教育近代化的历程。新学制虽然形式上披上了资本主义的外衣,但实质仍然受封建思想的支配。在这种情况下,整个教育,特别是语文教育,就呈现出新旧杂糅、良莠并存的现象。可以说语文的单独设科是我国新旧教育矛盾斗争的结果。

“壬寅—癸卯学制”奉行“中学为体,西学为用”的指导思想。所谓“中学”,主要指我国的“经学”和“中国文学”,这属于当时语文教育的内容。这种“中学”,为晚清统治者所维护。洋务运动派



虽然倡导学习西方技艺,却以“中学”作为其前提,奉“中体西用”为主臬。维新派比洋务派有所进步,提出用西方的思想进行文化启蒙。但他们仍然尊崇“中学”,其思想也难摆脱“中体西用”的窠臼。正因为如此,语文学科较其他学科因袭更为沉重,发展中遇到的阻力更大,颇有积重难返之势。但无论如何,新学制的颁行,西方教育思想的传播,毕竟给传统语文教育思想以极大的冲击,语文教育也有所变革。

中国近代一些著名人物的政治和文化教育思想对这一时势的语文教育有很大的影响,并留下了深深的印记。其间有曾国藩、张之洞、康有为、梁启超、严复、谭嗣同、蔡元培、胡适、鲁迅等代表人物,他们之中,有的主张“尊孔读经”,有的倡导“西技西艺”,有的固守“中学”,有的推崇“西学”。在语文教育方面,他们有的坚持读古代经文,有的主张革新文言,还有人提倡大众语文。在这种状况下,这一时期的语文教育思想呈现出复杂的局面。一方面,我国传统古文教育思想虽受到冲击,但仍顽强存在;另一方面,近代“中国文学”教育思想开始萌发、成长,语文教育向科学化、大众化方向发展。

考察这一时期的语文教育思想,我们不仅要指出其历史重负和局限性,更要关注其历史经验和进步性,从中发掘值得重视并对后来语文教育思想有影响的部分。近代中国教育是在“新学”和“旧学”的斗争中步履艰难地发展的。虽然从整个历史进程来看,新学逐步地战胜并取代旧学,成为教育的主导思想和主要内容,但是,中国毕竟经历了几千年的封建社会,封建思想根深蒂固,摆脱封建思想的束缚异常艰难。这样,中国近代教育上的变化,就不是旧学的迅速灭亡和新学的快速增长,而是新学和旧学杂陈,甚至是旧学缠住新学,呈现出一种良莠混杂的现象。



“壬寅—癸卯学制”的颁布标志着中国教育近代化的正式开始,在某种意义上,这是“西学”对“中学”的胜利,但实质上,这只是“西学”和“中学”相互妥协的结果。“壬寅—癸卯学制”形式上具有了西方近代新学制的特点,但“中体西用”的指导思想却使它具有浓厚的封建性,表现在语文教学上,就是要学习中国文辞,并以此来保存“国粹”。

“国粹”按字面意思,应该是指一个国家、民族文化传统中的精华。一个民族的文化,是由该民族共同体在长期的社会生活和历史进程中逐步发展起来的,它对民族心理、民族思维方式、民族性格等都有着深刻影响。因此,对民族文化应该辩证地看待,取其精华,弃其糟粕。但“壬寅—癸卯学制”竭力要维护的“国粹”,却是维护封建统治的封建伦常观念,即所谓的“忠君”、“尊孔”、“读经”,这与历史发展的潮流相违背,对当时风起云涌的救亡革新运动和近代新教育的发展都有阻碍作用。

“学习中国文辞,保存国粹”思想集中反映在张之洞、张百熙等以“中体西用”为指导思想制订的《学务纲要》中。其中规定:“此次遵旨修改各学堂章程,以忠孝为敷教之本,以礼法为训俗之方。”可见其教育宗旨仍顽固地坚守着封建传统教育的思想观念,宣扬的还是封建的忠孝观念和伦常礼教思想。这种情况在语文教育中表现得尤为明显。把中国的经书比同外国的宗教,引读经与信教、尊圣混为一谈。读经是信教的表现,目的是为了保存“圣教”。所谓“圣”,就是我国几千年封建社会宣扬的完美人物,指的是尧舜禹汤文武周公孔子;而所谓“教”,则是以三纲五常为主要内容的封建旧礼教。这种“圣教是封建社会立国的基础,所以他们会竭力维护。他们认为“读经”是保存圣贤之道的根本途径。这既是当时封建教育思想的必然表现,也是我国古代语文教育中



消极落后因素的延传,这种思想对我国以后的语文教学改革产生了很大的阻碍作用。

中国历经几千年的封建社会,既建立了灿烂文化,也积累了丰富的教育经验。几千年的封建正统教育皆以经学为主,因此读经思想在中国教育中影响深远。经学又与我国古代的文化紧密相关,于是有些人又把读经与继承民族文化、保存国粹等同起来,并以此作为在学校设立“读经讲经”课的理由,其目的是要维护封建统治基础。社会发展了,新思想出现了,封建的“圣教”和伦常观念自然会受到质疑。但“保圣教者”自有他们的办法,这办法就是鲁迅所讽刺的“新起的思想,就是‘异端’,必须歼灭的,待到它奋斗之后,自己站住了,这才寻出它原来与‘圣教同源’”。这样“圣教”就可以永远地保存下去了。如果说“保圣教”是官方、政府的政策,那么“存国粹”则可以说是维护封建统治和封建文化教育的封建知识分子思想的表现。两者本质上是一致的,它们相互配合,共同反对新思想,维护封建政治统治和封建的文化教育政策。

“中国文学”这个名称始见于《学务纲要》。纲要规定设“中国文学”一种,并宜随时试课论说文字,及教以浅显书信、记事、文法,以资官私实用。但取理明词达而止,以能引经史为贵,不以雕琢藻丽为工”。指出了学习中国文学的实用性目标和要求,即学习中国文学是为了议论时事和书信记事等官私实用,要求“理明词达”。这虽是中国语文教育从注重伦理道德教育走向语文教育本身的重要一步,但又是极不彻底的一步。即使是为实用,也仍然要求“以能引经史为贵”。这是读经、复古思想的遗毒,由此可见读经、复古的观念依然根深蒂固。

语文教育的内容,虽然它的宗旨是保存“国粹”和维护“圣教”,其性质是封建主义的,但“中国文学”科毕竟于此时应运而